

貴州政壇憶往(一)

貴山富水舊夢痕

何輯五

貴州新軍被迫離黔

我是貴州人，但是我在貴州的時間，遠比在外省的時間為短。大約是民國十一年罷，我隨着由谷正倫大哥所統率的貴州新軍，在貴州不能立足的痛苦環境之下，離開貴州，奔赴桂林，聽候國父孫先生的指揮。其時，國父正統率大軍，設大本營於桂林，致力北伐，我們那一部分貴州新軍，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作戰力極強的部隊，國父對我們信任有加，特令挑選一連，擔任國父的警衛隊。我當時就是這一連的連長，對此任務，感到特殊的光榮。自此，我就正式參加革命的陣營，一直到全國統一，都在省外工作，直到民國十八年，纔奉 蔣總司令面諭，回省任職。

談到貴州谷部新軍不能在黔立足，不能不奔就國父，不禁引起我一段慘痛的回憶。貴州新軍之成立，是王文華（字電輪）二哥一手奠定的基礎。大家都知道民國四、五年間，滇省舉義討袁，稱護國軍。當時貴州督軍是劉顯世，王文華二哥是劉顯世的外甥。劉顯世在職之初，即以訓練新軍之責，交付電輪，電輪才高志大，有志於

革命救國大業。他所訓練的新軍，是極富革命思想的節制之師，與當時西南一般部隊之性質，極不相同。他更網羅了當時貴州第一流的軍事人才，如三家兄應欽，以及谷正倫（紀常）朱紹良（逸民）等，都是後來國民革命軍中的卓越人物，勳業彪炳，名震一時。護國之役，蔡松坡將軍率第一路軍，由黔入川，被北洋軍和部分川軍阻扼於瀘州前線，相持不下；貴州新軍則由電輪率領，出婁山關、松坎、下碛江、重慶，分兩路向成都進擊，成破竹之勢。但是滇黔聯軍之入川，引起部分川軍的反感，反與北洋軍站在同一戰線，與討袁義軍相拒。川中原有革命同志所部的川軍，又復意見紛歧，未能一致。最不幸的是出征黔軍中的假革命分子袁祖銘，竟中途變節，至入川黔軍，不能不向後撤退。電輪二哥深感貴州新軍槍械不足，實力尙待補充，因赴滬籌購軍械，俟接洽有成，再行回黔，為革命事業作更大的發展。電輪二哥因國父另有重要任務，脚命奔走，一時無法回黔。卒中賊人奸計，被刺於上海一品香餐館。這一變局，遂使黔中反革命新軍閥，控制全局，新軍益感孤單，為保全實力，惟有出黔之一途了。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擅於投機的袁

祖銘，又接受國民革命軍的命令，其部下的彭漢章、王天培分別接受第九、第十兩軍的軍長，袁則以什麼指揮的名義，盤據湘省的沅江下游地區，旨在擴充地盤。時唐生智以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導引革命軍入湘，自矜其功，氣概不可一世。朱紹良因以「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諷示之，袁祖銘卒為唐生智所除，真可以說是報應不爽了。

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黔省軍政落入與袁有關的另一軍閥周西成之手。周西成亦擅於投機，頗示好於革命軍。中央爲了發展貴州黨務，特派黔籍同志張道藩回省工作。周西成對張道藩同志陽示歡迎，暗中監視甚嚴。及發現道藩同志以密碼向外通訊，乃逮捕之，榜掠甚慘，繼之以囚禁。後來獲釋，特編「密碼」劇本，自任主角而演出之。其中雖多穿插，大體上是記實之作。軍閥之反臉不認人，毫無道義與理性，由此可知。

奉派至川滇黔聯絡

十七、八年間，滇黔之間，忽生戰事，其原因是由於滇省龍雲欲擴充其地盤，席捲貴州。先派吳學顯至黔騷擾，未能如願，乃出動軍隊，向

貴州進軍。周西成率部禦之於黔西重鎮的關係嶺。但在這一役中，周西成竟被擊斃，殘部由其妹夫毛光翔指揮，形勢甚為危殆。最高當局鑒於龍雲之擅自擴充地盤，頗為不合，且黔省既甚貧瘠，不堪再遭兵禍，西南亦宜安定，不可發生動亂；鑒思再三，決定派我回去，任調停之職，且負聯絡川軍劉湘之責，劉湘的二十一軍軍長的派令，要我親自送交。於是我自出黔以後，第一次返回貴陽。時由南京經重慶而至貴陽、昆明，交通至為不便。由南京至重慶，尚可乘江輪直上，但

須在漢口、宜昌換船，非二星期不能到達；但是這一段路，還算是最舒適的旅程，由重慶而至貴陽、昆明，則須坐山轎，此即一般所稱之「滑竿」，或云應作「華蓋」，不知孰是。山路崎嶇，翻山越嶺，日行不過數十里，途中須經一月有餘，不用說，這是最艱苦的旅行，此川黔人士所以在出關（夔關）以後，常不願返鄉的重要因素了。但最高當局既賦我以如此重大的任務，我是義不容辭的，和劉湘的聯絡，總算仰仗最高當局的威望和劉湘的深明大義，達成任務，並不困難。



一手莫定貴新軍基礎的總司令王文華遺照。

對黔滇 齟齬的 調處， 費了不 少的唇 舌，總 算也不 辱使命 。在雙 方協調 收效後 ，貴州 省政府 主席一 職，遂 落入毛 光翔手 中。貴 陽是我

舊遊之地，但際逢六七年，人事全非，感觸殊深。此行的收穫果然不少，但我個人最大收穫，莫如因此而得返回與義原籍，省視久別的老父，略盡晨昏定省之禮，得敘天倫之樂，誠可謂意外之幸事了。

回籍省親家中遭遇

我家原住與義縣的黃草壩，壩就是山間小平原，西南人統稱為壩子。我們的原籍是江西，落籍於此者已五世。家君明倫公，務農之餘，兼事質遷，家道因稱小康。明倫公生活節儉，但有所積蓄，輒以舉辦善事，如修橋補路，置設津渡，以便行人，與辦學校，以教育鄉村子弟，力有不逮，則籲請鄉人為助，此外世事，一概不問。生我兄弟五人，長應楨、次應祿、三應欽，我行四原名應瑞，五應炳，即縱炎。自幼督教甚嚴，我兄弟得以卓然自立，皆家庭教育之效。長兄從事教育事業，承父志也。次兄經營質遷，皆得長依膝下，承菽水之歡。應欽與我等，則致力於革命工作，遠離家鄉，我在此際回籍省親，老父頗以為慰。在表面上看到，老父精神矍鑠，健康不減當年，頗感欣慰。我以為報親之日尚多。兼以黔滇矛盾，尚須進一步的安排，故盤桓數日，即過返貴陽，但是沒有多久，竟得父親逝世的噩耗。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是我長作無父之人的最悲痛的日子，早知如此，則我豈肯遠離膝下，以致失去最後侍奉湯藥之機會。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泉魚之痛，其何以堪。三復歐陽公「祭豐不如養薄」之言，使我痛徹肺腑，

呼天搶地，無以自贖其罪。

先是，我兄弟在外致力於革命運動，舊軍閥忌之甚深；莫奈何我兄弟，則轉其目標於我父。我家疊被抄掠，舊居難安住。我父乃率家屬，避居於桂滇交界的瘴癘之區，水土不服，致嬰足疾，漸至無法醫治之程度。但我父有家報，皆諱言之，但云平安，勸勉我兄弟務必捍衛黨國，勿以家務為念，即我回家省親之時，亦故作無病狀，以慰遊子之心，其對我兄弟愛護之深及為國為黨之忱，公而忘私實有足多者，乃因此而竟使我兄弟，尤其我更負不孝之大罪。凡此情形，我等皆在事後方知，殊不知將何以慰我父在天之靈。

失怙之痛 移孝作忠

先君逝世的消息，第二天始達貴陽，我在昏

亂中，只知道立即電告在京的三家兄應欽，應欽時任軍訓總監，實際軍事方面的各種情形，得最當局之信任，依畀甚深，常常為最高當局分勞分憂，或代行某種特殊任務，公務十分繁重，三家兄得此噩耗，痛不欲生，立即向最高當局呈辭去本兼各職，準備回籍奔喪。時 蔣公正任國民政府主席，立至三家兄寓慰問，並退還辭呈，勸以移孝作忠，並請依戴季陶先生喪母例，給假守制，在京設奠，以盡孝思即可，不必拘丁憂舊制，使黨國蒙受影響。三家兄深恐未能盡人子孝親之禮而被譏於時，特囑王淑芳同志往訪戴季陶、胡漢民兩先生。戴先生適不在京，胡先生意：中

世伯何明倫先生像贊
 旣、府君雅量寡儔重孤
 夫田長不追求甯惟有容
 亦壯其歆興學造士練團衛
 州革命軍起命子相投曰毋
 內顧黨國是憂子唯而出十

華民國之正式禮制尚未頒布，因此喪服亦無規定；不若斟酌情勢，擇一儉樸而能表示哀悼之形式行之。「禮與其奢也寧戚」，三家兄常服膺斯義，故遵 蔣公訓示，在京守制行禮。 蔣公與各院院長及黨國先進，即譚延闓、胡漢民、戴季陶、趙戴文、林森、古應芬等組織治喪委員會，設辦事處於南京最大之叢林毘盧寺，定期行禮。 蔣公並親書先君像贊曰：

「旣旣府君，雅量寡儔。童孤夫田，長不追求，寧惟有容，亦壯其歆。興學造士，練團衛州。革命軍起，命子相投，曰毋內顧，黨國是憂。子唯而出；十萬十裘，功垂竹帛，伊呂與倅，循骸潔養，曾未少酬。如何府君，遽臻彌留，遺像清高，光動斗牛。盥手述贊，久之千秋。」

其他黨國要人如譚延闓、胡漢民、趙戴文、吳稚暉、戴季陶、蔡元培等，均有像贊，開弔之日，素車白馬，哀榮一時稱最。皆先君默默耕耘之德報。

我在貴陽，一以到日不久，酬應尚少，一時以京中已有盛大之哀悼，貴陽即使舉行儀式，亦不能過此，故惟一切從簡，默悼於心，以誌呼天搶地之哀而已。此為我至貴不久以後的椎心刻骨之痛，誠抱憾終身莫贖之大過，天乎痛哉！

在先君開弔期間，中原戰事緊張，三家兄還奉命赴開封主持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工作，直至十月二十六、七兩日公祭之前，始自汴趕回南京

萬十表功垂竹帛伊呂與伴
循陔潔養曾未少酬如何府
君遽臻留遺像清高光
動斗牛盍手述贊久之千秋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
世恩任蔣中正敬題

蔣公介石親筆賜題先君明倫公像贊

。當時中央對三家兄之感情，實出于事實之需要，由此可知；而三家兄之勉從慰留，實亦先君平日教誨捍黨衛國之指示，亦善體親心之孝思。

再度返黔重要使命

滇黔事了，我返回首都，仍任監察院監察委員，此一職務，比較清閒，我是十分滿意。久經戎馬倥傯與長途勞頓之後，得此工作輕鬆的機會，足以休養我疲乏身心，正是我的願望。大約是民國二十四年夏天罷。蔣公忽然傳令，要我去晉見。當即面示，要給我一項新職務，那就是貴州省特派員，而且還賦予兩項特別任務，

蔣公介石親筆賜題先君明倫公像贊

其中之一，當時是一個非常的機密，現在說出來，也並沒有什麼關係，我的祕密任務是轉變搖擺不定的貴州局勢，使它真正納入國民政府的指揮之下。另外一項任務，是督修京黔公路未通部分，坦白的說，當時我的內心，對此新職務，實在不樂意接受，我自東路北伐軍揮師北進，擔任後方極為重要的潮汕警備司令之職。潮汕為東路軍的補給重地，一方面要綏靖地方，一方面要補給前方，責任之重，不可言宣。時廣東東路的大局，初告安定，而反動勢力，仍在環伺之中，軍力薄弱，求其安定，真是煞費苦心。雖前方捷報頻傳，勢如破竹，而我寢食難安，唯恐變生不測；

直要到京滬均克，暫告安定。說句實在話，我雖坐鎮後方，但是大責重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直與前方衝鋒陷陣，同其甘苦。以後，我擔任過中國航空公司的總經理，轉任監察委員，如釋重負，心神大為舒暢，尤其在上次黔滇之行，舟車勞頓，疲乏之久乃恢復之後，不意蔣公又要我肩此重任，我的表情，顯露出難於接受的神情。蔣公嚴詞督責，謂：你是貴州人，難道你不想為家鄉盡點責任；為國家解除些困難？貴州的地略位置，是綏徽西南諸省的中樞，國家多難，將來西南各省是我們國家抵抗敵人，復興建國的基地，你此行的更大任務，是督促各方面負責完成以貴陽為中心的公路交通網，你必需了解這個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我已考慮甚久，你是擔任此項職務的最適當人選，不用再躊躇了。蔣公既然如此看重我，又是如此的決心，我也諾諾而退，迅速揮當一切，再作歸計的準備了。這裏，我必須要特別說明一點，我之所以躊躇，並不是鑒於道藩的前塵，而有所畏縮。老實說，當時中央威信，已逐漸建立，華北雖有不明大義的黨人和新軍閥的事變，業已蕩平，贛南共匪亦已摧毀，餘下來的是如何建國以抗日？京黔等公路，為國家建國抗戰的基本建設之一，久未通車，致勞最高當局之憂，我為國家盡些力量為最高當局分些憂勞，是義無返顧的。只要我善於周旋，不仗中央和家兄的威勢以凌人，投機軍閥，諒亦不敢加害於我。何況一個革命軍人，接受命令，赴湯蹈火，在所不惜。最高當局既認為我是回黔工作的適當人選，那我這個區區暫時休養的個人之私，還有什

麼值得一提的。只是我離黔已有十餘載舊日友朋，均已星散，我怎樣找些新的朋友來協助我，達成最高當局賦予我的使命，內心不無懸懸而已。

我第一次回黔的時候，中日之間的交涉，黑雲滿天，緊張萬分，諸如東北的鐵路平行線問題的交涉，土地商租權問題的交涉，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在華北的種種詭謀如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問

題，以及南京發生的藏本事件等等，都顯示着中日關係，已至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但是最高當局成竹在胸，先安內，後攘外，先建國，後抗戰，已作種種有計劃的安排。我之返黔，最主要的任務，既然是在促成以貴陽為中心的西南公路交通網，這一任務，無異對日問題的前哨戰，也無異乎對日作戰的衝鋒陷陣。我認清了我的職務

之性質，也確定了我回到貴州以後的工作方針。

我既已確切認定毛光翔這一類變相軍閥不過是力求保全位置的自守之輩，只要我不侵犯其地位的安全，他必然不會加害於我。反之，我處處交好於他，使他不懷疑我之返黔，可能對他的地位發生影響，他必然樂於協助我推動交通建設的進行。我認定我在黔的工作原則，就照着這個方向去做，固然得到很良好的結果。那時候，國家的處境，既然如此的艱危，我的工作進行實在刻不容緩。所謂京黔公路，是國家十大公路幹線之一，當我回返貴州的時候，贛南的共匪老巢，已被突破，殘匪正在流竄，其方向正是由湖南而貴州，其未來的動向，似為趨向西康、四川，入滇也有可能，貴州適當其衝，兵災必難避免。中央軍隊踪追擊，不久亦必入黔，由此可知京黔公路在剿匪進行時所佔之重要地位，不僅如此，在抗日戰爭中，京黔公路所佔之地位，更為重要，此路之久築未通，無怪 蔣公為之不安，而要我去完成此項工作。關於京黔公路在抗日戰爭中之重要地位，可在十大國家公路幹線計劃中獲得一項證明。

當時國家公路計劃，十大幹線，其要如下：

第一，京魯幹線，以南京下關對岸的浦口為出發點，北經天長、淮陰臨沂、濰縣，而以樂陵為終點。

第二，京陝幹線，也以浦口為起點，斜向西北，經和縣、合肥、信陽、南陽，出荆紫關而達西安，並向西北延長，以達蘭州。

第三，京黔公路，自南京西南，經蕪湖、屯溪、東鄉、南昌、萬載、長沙、芷江而至貴陽，



先君明倫公遺照。(民國十八年九月逝世前留影)

長達一千八百公里，並自貴陽西南，延至昆明，所以這條公路也稱京滇公路。

第四、京川公路，浦口至合肥段，與京陝公路合用，自合肥分出，西經舒城、漢口、應城、宜昌、恩施、萬縣而至重慶，更自重慶向西北延長至成都。

第五、京閩幹線，也以南京為起點，經句容、宜興、吳興、杭州、紹興、天台、永嘉、平陽、福鼎、霞浦而至福州，南與閩粵公路相銜接，更自廣州向西南延長，經欽縣而至中越邊界的東興。

第六、滬桂幹線，以上海為起點，經乍浦、杭州、江山、上饒、吉安、衡陽、桂林而至柳州，更向西南經南寧而至中越邊界的鎮南關。

第七、海鄭幹線，起自江蘇東北部的東海，經徐州而至河南省平漢、隴海兩鐵路的交點之鄭縣。

第八、歸邯幹線，以隴海鐵路上的歸德（即商邱）為起點，南經亳縣、六安、安慶至德，其終點則在祁門。

第九、汴粵幹線，其起點為開封，經潢川、漢口、武昌、南昌、贛縣而至廣州。

第十、洛韶幹線，以隴海鐵路的主要站之一的洛陽為起點，南經南陽、襄陽、沙市、常德、長沙，直至粵北的曲江（即韶關）。

以上十條國家公路的建設大計劃，我要指出其中特具的幾點意義：

其一、當時國內公路僅一至二千里，除了幾條鐵路和水路尚可作動員之用外，各省區至華

北及沿海國防地區的交通，多恃大路，不堪勝任大軍之運轉，故在對日抗戰的準備中，大舉建設公路，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這些公路，從國家施政的觀點來看，都是直接或間接以首都南京為中心，由首都延伸至內地各省；從另一角度來看，那是動員內地各省的人力，物力轉輸至可能發生國防戰爭的地區，故其趨向或至沿海地區，或至隴海鐵路沿線。我必須指出：這一公路大建設中，延至隴海鐵路以北的只有京魯線，也只到樂陵為止。由此，可知最高當局對日抗戰的軍事策略，其重點部署在隴海鐵路以南。

其三、就這些公路的方向來看，大體上可分為下列三個原則：即一、通向西北的內地省區，二、通向西南的內地省區，三、通至南部的邊區。由此，可知最高當局業已清楚地看到，中日一旦發生戰爭，我國海口，必遭封鎖，而香港和越南的海防，都將是我國對外交通的出入口，故特別趕築浙贛鐵路和打通粵漢鐵路之外，又把公路建設至中越邊界，這些公路在國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四、最高當局更清楚地看到未來抗日戰爭的基地，其重心即在四川及其毗連地區，故自這一觀點來看這十條國家幹道中，通向西北與西南的兩條公路系統，最為重要。我們必須注意十條幹線中，直接通川的只有一條，而且在宜昌以上，不直接入川，而繞道恩施、利川等縣，這中間的主要因素，是因為宜昌以上的長江，穿巫山而出，兩岸都是高山峻嶺，施工至為困難；其不經

宜昌北方以入川者，則以川鄂之間的大巴山，也是高峻而難於逾越的大障礙。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通往西北和西南的公路，除其本身在動員運輸方面所負的責任外，兼負對川聯繫的任務。而西南公路即京黔公路或京滇公路，所負的責任尤重。尤其在我們失去海防的通海口而以仰光為通海口的前期，川滇東路和川滇西路都未築通，其進出口貨物，都須經由貴陽轉運。所以這一段時間的貴州部分的公路，我們稱之為國家運輸方面的大動脈之一部分，實不為過。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十八年至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之間的一段時間，實在是我國公路建設的巔峯時期。

自十八年開始是籌備時間，二十一年以後則為積極實施時期。最高當局命我返回故鄉，雖然負着雙重的任務，但尤其重要的是京黔公路的籌劃與建築的推動，另一任務雖然也很重要，但是我前面已經分析過，此種患得患失的自守之輩，只要他了解我之返黔，並不影響他的主席地位，他並且可以利用我作黔省府與中央之間的橋樑，他不但不會影響我的工作，而且還會協助我的進行。

我對毛光翔主席的態度，謹與交往，極隱秘地監視他有什麼陰謀或異動，但是表面上是極為親善的。我深深地感到我能够參加這一項既對抗日戰爭準備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又能為我的故鄉建設略盡我棉薄的力量，這一工作，具有雙重的意義。這是最高當局給我的榮譽，是我無上的光榮。

（未完待續）